试论布赖恩和平主义外交的思想根源

欧阳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大力推动和平外交路线,并成为当时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究其原因,布赖恩是美国传统农业社会理念的忠实继承者,因此其外交理念亦继承了美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孤立主义外交理念与强调兄弟之爱的基督教和平宗教观。

[关键词]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 和平主义外交; 孤立主义;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0)04-0013-05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外交舞台上,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人物。他于 1913—1915 年间担任美国国务卿,致力于推行和平主义外交路线,可以说是美国历届国务卿中几乎独一无二的和平主义外交的倡导者,亦是 20 世纪初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主要表现为:在一战前积极策划并实施其国际仲裁体系的战略构想;一战后又力促美国对各交战国进行调停,并极力主张美国保持中立、反对美国参战,并由此而与威尔逊总统产生分歧,进而愤然挂冠而去,在民间继续为反对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奔走呼号。尽管其辞职之举在当时受到不少舆论的谴责,认为这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时所做出的叛国之举。但他不改初衷,坚持其和平、中立的外交理念。于是,人们不禁会问,在群情主战的当时,布赖恩为何会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固守其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呢?笔者经过研究后发现,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理念与强调兄弟之爱的基督教和平宗教观是布赖恩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主要思想根源。前者与“美国例外论”息息相关,主张保持美利坚“山巅之城”的理想与纯洁,不卷入欧洲事务,不进行殖民统治;后者以耶稣的“山巅训诫”(Sermon on the Mountain)中关爱、忍让与和平的教诲为基础,倡导舍武力而求和平的外交理念。布赖恩是美国传统农业社会思想文化的忠实继承者,所以孤立主义外交理念在其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布赖恩又是虔诚的基督徒,结果崇尚和平便成了其宗教信仰在外交领域的自然延伸。

一 传统孤立主义外交理念的继承者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 19 世纪末之前的美国外交,这个词就是“孤立主义”。孤立主义是这段时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主要思潮之一,它使美国在处理外部关系时深深地留下

这方面的痕迹^①。孤立主义在美国具有特定的内涵。美国的孤立主义绝不是画地为牢、自缚其身,而只是希望“把美国从政治上与欧洲大陆常常发生的动荡‘隔绝’开来”^{[1][2]}。美国学者塞维尔认为,“孤立主义”的实质意味着拒绝在美洲以外参与任何长久的同盟,尤其是参与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同盟,其在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典型的表现是“拒绝卷入欧洲冲突”,而核心目标则是维护美国自身独立与安全,将外部威胁减少到最低程度^[2]。可见,维护自身安全、保持独立自主是孤立主义之鹄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塞缪尔·贝尔斯就将孤立主义的代表文件——华盛顿总统的《告别词》称之为“外交政策的独立宣言”^[3]。

在某种意义上说,“孤立主义与美国的历史一样古老”。从早期移民飘洋过海在北美大陆登陆的那一刻起,孤立主义即在人们心中悄悄扎下了根,之后随着国家的独立,孤立主义这棵小树便更为枝繁叶茂,逐渐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美国民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外交理念。究其原因,这是与北美大陆的特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意识分不开的。

首先,北美与欧洲大陆在空间距离上的遥远,是孤立主义产生的最初和最直观的原因。最早赴美的移民,或为逃避欧洲母国的宗教、政治压迫,或为解脱经济困境以求得更好的前程。他们在浩渺的大洋上漂流数月,长途劳顿,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到达美洲。这就使移民们一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就深切地感到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已远离了欧洲。为在新环境里能生存下来,移民们经过艰苦的努力建立了新大陆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最终催生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是一个与旧世界迥然不同的新世界,它有一望无际的良田沃土、茂密辽阔的森林与草原,还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这里的政治、宗教环境比较宽容,社会贫富差距比较小,等级制度比较弱化,也没有欧洲大陆接连

[收稿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 欧阳惠(1972-),女,湖南新化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

不断的战争与饥荒。于是,北美大陆给人们带来的所有这些和平、自由与机会,让移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也进一步扩大了与欧洲的距离感。

其次,早期清教移民的宗教信仰也是“孤立”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最早的清教移民本着“纯洁”基督教、在北美建立一个模范的清教社会的目的来到新英格兰,立誓要继续进行清教试验,“弘扬上帝的荣耀,推进基督的信仰,同舟共济,以契约的形式组成政府”,以求自我完善,把北美建成新的耶路撒冷^{[1]32}。后来担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总督的温斯洛普在上岸前语重心长地告诫同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象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4]“山巅之城”这一术语以后便逐渐成为美国把自己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象征。美国学者迈克尔·亚当斯认为,温斯洛普的“山巅之城”概念在美国形象和信念中“经久不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经历的象征”^[5]。1667年,马萨诸塞州的著名牧师因克里斯·马萨亦这样宣布:“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像那些为传播福音而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第一代基督徒一样的一代人,他们将奢华淫乱之都的教会与非教会的法规制度抛弃得如此彻底。”恰如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西格尔所言,“孤立主义反映美国人中新教徒的观念:美国是上帝的选国,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一座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1]123}尽管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早期清教徒移民的这种宗教“使命观”后来逐渐演变成美国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思想根源之一,但在19世纪末之前,深具“使命观”的美国人还甚少想到过“普渡众生”(即便想到,也只是希望用榜样而非武力影响世界),只希望在北美建立自己的“理想王国”。于是,不屑于卷入没落残破的欧洲各国纷争的孤立主义情绪便应运而生。

最后,国家安全也是孤立主义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早期美国国力尚弱,维护国家安全是重中之重。而当时的欧洲是战祸的发源地,因为欧洲各国的专制制度使得君主可以自行其事,于是君主之间经常为一己之私而挑起战争。因此,美国虽与欧洲各国进行贸易,但力图使自己与欧洲没完没了的纷争保持距离。一方面,与欧洲分离和不卷入就意味着国土安全,因为这将使地理上的隔绝所提供的天然屏障更加固若金汤,美国则可以放心享受“免费的安全”。另一方面,不卷入欧洲事务还意味着美国共和制度的安全,使之免受欧洲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熏染,从而让美国人民可以集中精力开发北美大陆,把美国建设为“一个自由、伟大的国家”,“为人类树立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新颖的榜样。”^[6]

于是,从联邦政府成立直到19世纪末,与欧洲国家在政治上不建立任何结盟关系,同时致力于北美大陆的扩张,就成了美国政治精英们的共识与外交现实。1796年,华盛顿总统在“告别词”中告诫美国人民:“我们对待外国应循的最高行动准则是,在扩展我们的商业联系之时,应尽量避免同他们发生政治上的牵连。”^[7]之后,随着美国的逐渐强大与

国际形势的发展,孤立主义原则被政治精英们从本国扩展到整个美洲。1823年11月,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致俄国的照会中宣称:美国“不怀有以武力传播美国政府赖以建立的原则的企图,也绝不干涉欧洲的政治事务,同时期待和希望欧洲国家同样不要把它们的原则扩散到美洲。”^[9]同年底的门罗宣言使这一共识成为政策,并被认为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基石之一”。宣言中阐述的三大原则,即“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准殖民原则”实际上再次重申了孤立主义的基本立场:美国与欧洲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决不能彼此干预对方事务。宣言坚定地宣称:“让各方自行其事是美国真正奉行的政策,此举的目的是希望其他国家同样也能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孤立主义不仅仅是政治精英们的一种外交策略,久而久之,它逐渐成为普通美国人思想情绪的一部分,成为一种民族意识。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孤立主义情绪被牢牢地灌输于每个人的意识中,以致它的号召力及影响在两百年之后仍然可以感觉到。它为美国在一个纷争的世界上完成其使命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影响。”^{[1]128}的确,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和平环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客观条件。正是在这种很少有外来威胁的发展过程中,孤立主义精神牢牢地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文化之中,长时期地影响着每个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与行为。

然而,到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的对外贸易量大幅度增长。同时,大量前往国外的商人与传教士的经历也使得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兴趣与日俱增。因为贸易与传教活动需要保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建造设备先进的战舰,以建立一支新型的现代化海军。尤为重要的是,当时一些欧洲工业国家如英国、德国与日本在海外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让不少美国人意识到,经济发展与对外扩张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总之,到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人当中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情绪开始动摇。民众舆论有了一些主张卷入海外事务的扩张主义者的声音。

总体说来,这些扩张主义者主要来自东部城市或大都市地区,那里的经济最为发达,也是美国传统的对外贸易中心所在,人们容易接受新事物与新理念。相比之下,来自中西部、南部等乡村边缘地区^②的民众则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孤立主义理念。美国学者勒罗伊·里塞尔巴赫对第76、80、83、85届国会议员有关外交政策的投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议员们最为倾向于孤立主义,其次为南部和西部,东部地区议员则最倾向于扩张主义^③。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美西战争后是否占领菲律宾与美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④。

关于中西部、南部边缘地区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更趋于孤立主义立场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尽管随着19世纪中后期商品农业的发展,国外市场的扩大在解决农场主经济困境上的作用已经比较明显,但绝大多数农场主其实与国外市场并无直接联系,他们根本无法了解是谁购买了他们的农产品,因而难以对开拓国外市场的重要性感同

身受^[8]。那些住在乡村的人们没有亲眼目睹以城市为基地的国际工业与贸易交往, 也比城市居民更难以接触到大众传媒的信息, 对世界其他地方缺乏了解, 所以与城市居民相比, 他们对于美国的国际交往更缺乏容忍度。其次, 与农场主直接打交道的是中间商, 但中间商却是他们憎恨的对象, 他们自然也无法容忍为很多中间商所支持的海外扩张。农场主们认为, 中间商千方百计压低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价格, 其所代表的东部城市财富集团是剥削、压迫、掠夺其劳动成果的罪魁祸首。这种反感情绪在平民主义时期已然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平民主义运动偃旗息鼓之后仍未能短时间内消除。因此, 只要是东部地区、城市财富集团所赞成的主张, 中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就毫不犹豫地反对, 在海外扩张政策上即是如此^[9]。据民意调查, 反对战备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平民主义运动曾经盛行的地方, 那里的人们认为“扩充战备会导致战争”, 而“我们伟大的孤立”使战备毫无必要。他们对东部“财富托拉斯”的愤恨进一步增强了反对扩充战备的情绪。例如, 一家内布拉斯加报纸就指责那些“战备宣传”是在“为军火商与钢铁托拉斯的利益买单”^[10]。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中西部、南部地区位于内地, 与欧洲相距遥远, 所以当地人在地理上与外界的隔离感比东部更为强烈, 他们认为美国几乎不会有受到军事威胁与侵略的可能性, 当然也难以意识到一个与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具有密切的贸易、文化联系的事实上早已存在^[11]。内布拉斯加的一家报纸在批评扩充战备的做法时评论道: “本州人民丝毫没有感觉到让军火商们所惊恐万分的(被侵略)危险。我们毫不担心这儿会遭到侵略。”南部也是如此, 1914年秋天针对各家报纸编辑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 希望保持中立的南部编辑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地区^[12]。

作为平民主义运动时期著名的乡村地区代言人, 布赖恩在孤立主义问题上显然也代表了这些地区的主流民意。在他三次总统竞选(1896、1900、1908年)中, 每一次竞选都赢得该州选举人票的共有 14 个州, 其中 12 个在南部, 两个在西部山区; 两次竞选均赢得该州选举人票的州——科罗拉多、密苏里、蒙大拿与内布拉斯加州——也均为南部或(中)西部州。鉴于这些最倾向于孤立主义的乡村边缘地区也是最为支持布赖恩的地区, 布赖恩坚定地主张“孤立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 这并不是说布赖恩创造了孤立主义或者他的支持者将他不赞成的观点强加于他。其实, 布赖恩本来就是所有这些乡村美国人的一分子, 其孤立主义思想都来自于同样的背景与价值考量。如果布赖恩在其他问题上都站在乡村美国人一边, 而在孤立主义问题上却与之相反的话, 那才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简言之, 布赖恩是保罗·格莱德所谓的“中部边界”(the middle border)地区即中西部乡村地区的代表^[13]。他从未想过要背离那些他在家庭、教会、学校中所获得的价值观, 也从未尝试着去接受其他与之不同的价值观。可以说, 他的一生都未曾对自己从小所接受的这些信念有过动摇, 也未曾对那些与他有着同样价值观的人民失去过信心。于是, 在孤立主义问题上, 他再次与他的传统、与他的人民, 坚定不移地站

在一起。

二 以基督教“大爱”为基础的和平主义理念

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不仅受到了美国农业社会传统的孤立主义的影响, 而且与其虔诚的基督教信仰一脉相承。在其童年时代, 父母就让他熟读圣经, 牢记耶稣的教诲。在其著名的《和平之子》的演说中, 布赖恩是这样描述耶稣作为“和平之子”的大爱之心的:

“当你仔细研究耶稣基督的性格, 你会不由得意识到他所具有的一些美德: 他的纯洁、他的宽以待人、他那深邃的爱。……爱是基督信念的基础。他的爱像海洋一样广阔, 它波及的对象甚至包括敌人。其他的教师是通过规则来约束学生, 但基督的做法却是净化人的心灵, 让爱来指引人们前进的方向。……因此他是完全担当得起‘和平之子’这个称号的。如果他能够给每一颗心灵带来和平, 如果他的信念能够得到实施, 为全世界带来和平, 那么谁又能说他担当不起和平之子这个称呼呢?”^[14]

布赖恩认为, 基督教是传播“爱”的宗教, 作为基督徒, 就有义务维护和平, 避免使用武力。这样的和平主义思想在他心中由来已久。早在 18 岁时, 布赖恩就在给堂弟托马斯·马歇尔的信中写道: “铿锵的金戈铁马、闪闪发光的钢盔、血淋淋的战场, 这一切都对我毫无吸引力! ……但是, 汤姆, 你知道吗, 由军队来一统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个光明的时代就在眼前。正义将会替代武力。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你不再需要杀死一个人来说服他你是对的, 而一个国家也不需要消灭另一个国家来证明它的原则是错误的。”^[15]

在布赖恩看来, 战争是一种动物层面的野蛮武力行径, 而和平的基石则是爱、公正和兄弟之情。布赖恩在自己的演说和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以上观点。他明确指出: “所有和平运动的背后都有着兄弟之爱的元素。……如果我们要建立永久的和平, 就必须建立在兄弟之爱、手足之情的基础上。”布赖恩坚信, 这种兄弟之爱的精神就是基督教诲的灵魂所在。他还认为, 在战争中, 决定一切的是野蛮的武力, 而不是基于对与错的理念。武力永远都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上帝的力量就从不借助于暴力, “世界如果抛弃了武力冲突, 转而让正义法庭来解决争端的话, 世界丝毫都不会堕落。”布赖恩相信, 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那时候人们不再因为和另一个人意见分歧而将其杀害。他担心的是, 人们的智慧和理性, 如果不是被爱浇灌, 被兄弟之爱的情谊所激励, 亦会步入歧途。一个疯狂的人与冷静的人是完全不同的。疯狂的人会做任何能做的事情, 而冷静的人则只做他应该做的事情^[16]。

布赖恩对他国的访问使他进一步体会到人类是一个大家庭, 从而加强了他对和平的信念与对战争的厌恶。1904年, 他首次出国回来后在纽约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示, 在访问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之后, 他认为国家的强大与否并不在于其军事力量, 而在于是否为和平作出了榜样。他对荷兰的和平运动深有好感, 并对海牙国际法庭印象深刻。1906年, 布赖恩在完成环球旅行回来后的一次演说中说, 他从欧洲带回来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和平的信息。他承认自己对杀戮的反

感与日俱增。战争就是人们屈从于自己欲望的证明,而对文明的考验则是人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争端付诸理性的仲裁而不是刀剑的交锋。布赖恩对“金元外交”背后的武力威胁也持反对态度,他宣称武力不能被用于讨还私人债务,美国私人在他国的投资与企业必须遵循这些国家的法律^{[17] 65-67}。

布赖恩和平主义理念的加强,与他跟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晚年信奉基督教,受圣经中“山巅训诫”^⑥的影响很大,其中关于“不要报复恶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⑥等诫命使他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和平主义者,萌生了“非暴力”与“不抵抗”的思想,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名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托尔斯泰的这些思想对之后的“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曾有过巨大的影响。布赖恩作为与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人,对这位大文豪晚年的著作更是喜爱有加,对其十分仰慕。早在1901年他还未能与托尔斯泰谋面时,布赖恩就在《平民报》中称赞托翁将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903年末,布赖恩访欧期间在托尔斯泰家中呆了整整一天,两人就劳工、财产、政府、宗教,尤其是和平与不抵抗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谈。他将托翁称为“爱的使者”,因为后者相信不抵抗的原则,即相信邪恶终将被善良所征服而且只能靠善良来征服的原则。

在这次会面中,布赖恩向托尔斯泰请教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一名不抵抗主义者,在运用武力保护自己与运用武力保护别人之间是否有所不同。尤其是当一个弱小的孩童需要保护的时候,使用武力是否就有必要。托尔斯泰对此作出了断然否定的回答。他说:

“当我们没有完全皈依于自己的理想之时,可能会发现不运用武力是多么困难,但这并不是让你运用武力的正当理由。此外,也不能就此例外情况来制定规则。我们这个世界上之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武力的牺牲品,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运用武力是理所应当的;你看我现在已经垂垂老矣,但确实实实在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需要我运用武力来保护一名孩童的情况。我宁愿从我实实在在看到的现象来思考,而不会凭借臆测来判断。”^{[18] 102}

后来托尔斯泰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所做的如下阐述,更使布赖恩觉得获益匪浅:“其实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遇到过自己想像当中的这个强盗和孩子,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历史上人们所有的恐惧都来自一件事——那就是人们都相信他们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假想的未来行为之中。”^{[18] 102}

尽管布赖恩并没有因此而转变成与托尔斯泰一样的非暴力不抵抗主义者,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在经过与托翁的交谈以及阅读其作品后无疑得到了强化。他称赞托尔斯泰“是俄国知识界的巨擘,欧洲的道德巨人,世界上最著名的仁爱法则的支持者。”在布赖恩眼中,这个人“不仅仅是爱之法则的信仰者,还是非抵抗原则的信仰者,他向全世界宣称他相信爱是比武力更好的庇护所;他认为人们避免使用暴力会比他使用暴力受到的伤害更小。其结果又是如何呢?他是俄

国唯一一名沙皇不敢对他动手的人。”^[19]

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的思想使布赖恩更加坚信基督之爱是社会进步的指南。这主要是因为他十分推崇托尔斯泰对宗教的看法。托尔斯泰认为,“真正的宗教是一种关系,就像理性和知识一样,是人们建立起来的和自己周围这个无限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正是宗教将人们自己的生命与这个无限联系起来,并且指引着人们的行为”^{[18] 100}。他还曾说:“宗教情感并不是对于不可知的自然力量的迷信与恐惧,而是人类在感知有限的自身处于一个无限的宇宙中时,对自身罪孽的一种意识。”布赖恩认为,托尔斯泰这种以爱为核心的宗教观,是非常鼓舞人的;它能带来道德的改观,进而带来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好转,也就是进步。所以布赖恩说:“我倾向于认为爱而不是恨才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基本法则。当各国进步的程度都是和它们脱离恨之法则和拥抱爱之法则的程度相一致时,恨怎么能成为进步的法则呢?”因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在他看来就是应予反对的恨的法则。

1904年,布赖恩在一次演说中对自己以基督教爱之法则为基础的和平主义理念作了如下的总结:“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担忧军事理念的最终胜利。如果该理念代表了我国的价值准则,那将是一次倒退,而不是进步,将是重新回到暴力时代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是对世界基督教文明的挑战。”^{[17] 51-52}

由此可见,布赖恩是美国农业社会传统外交理念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基督教福音派关于人类兄弟之爱的宗教观的实践者。布赖恩固然也有将基督教大爱散布于人间的理想,但是和其新教徒前辈们一样,他关注更多的是外部世界的危险与腐败,希望美国作为“山巅之城”去展现基督教理想的榜样,而不是让山姆大叔在世界各地去挥舞大棒。所以说,无论是从孤立主义还是从基督教兄弟之爱及新教“山巅之城”的理念来看,布赖恩的和平主义外交思想都是在美国外交政策遭遇现代化挑战之时对美国农业社会传统信念的坚持与继承。

注释:

①“孤立主义”一词在19世纪末成为政治词汇被用于描述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其含义就带有很强烈的不确定性。还有不少学者对孤立主义的存在表示怀疑,认为美国既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绝对的孤立状态,就谈不上什么孤立主义。的确,如果与17、18世纪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相比,与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中国相比,美国的“孤立”并非如上述两国那样在地理、政治、经济上处于比较与世隔绝的状态,美国自始至终都与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完全否认孤立主义的存在,在深入了解美国“孤立主义”内涵的基础上,国内学者王伟等认为,孤立主义不是某些人物或某个集团杜撰出来的名词,它是历史的产物,“基本上能用来说明美国早期的外交”。关于“孤立主义”一词的不确定性,见:Bernard Fensterwald, Jr. “The Anatomy of 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Expansion.”

Part I", in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une 1958: 112. 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Century Reaction*, New York: 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Century Reaction*,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1957: 20. 关于美国学者对孤立主义是否存在的怀疑, 见: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W. W. Norton, 1972: 21. 威廉斯在该页还列举了一些与其具有相似观点的其他论著。王玮观点见王玮, 戴超武. 美国外交思想史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69-70.

② 19 世纪后期, 美国经济的地区性分野由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迅速增大而变得分外明显。以研究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和经济发展而著称的美国政治学家伊利莎白·桑德斯认为, 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在 300 美元以上的地区成了以工为主的“核心”地区 (core regions), 人均制造业增加值低于 200 美元的地区则是以农为主的“边缘”地区 (periphery regions), 而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在 200-300 美元之间的地区可以说是工、农业并重的“混和”地区 (diverse regions)。据此标准, 1913 年的美国有 13 个州属于核心地区, 23 个州属于边缘地区, 7 个州属于混和地区。同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共 435 个, 其中 150 个属于核心地区, 204 个属于边缘地区, 81 个属于混合地区。见 Elizabeth Sanders, *Roots of Reform: Farmers, Workers,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877-1917*,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9: 23-27.

③ 中西部尤其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传统中心”。见勒罗伊·里塞尔巴赫. 孤立主义的根源: 外交政策当中的国会投票与总统领导. Leroy N. Rieselbach, *The Roots of Isolationism: Congressional Voting and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 [M]. 印第阿纳波利斯: 伯布斯-梅里尔出版公司, 1966: 106. 国会投票研究见该书第 108-109.

④ 应该说, 1898 年美西战争的爆发并未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反对, 因为尽管美国是与欧洲国家西班牙作战, 但其首要目的是为保护拉美国家古巴的独立, 尚属于捍卫“门罗宣言”的范畴。直到之后在是否占领菲律宾的问题上, 扩张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的分歧才真正显现。

⑤ 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讲述的是在公元 30 年前后耶稣带领追随者来到山上, 随后给其追随者讲道的故事。其中第 5 章“山巅训诫”中“论报复”、“论爱仇敌”等部分对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影响最大。

⑥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9、43 节。

[参考文献]

- [1] 王晓德. 美国文化与外交 (修订版) [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8.
- [2] Max Saville. Colonial Origins of American Diplomatic Principles [M].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1934 (3): 336.
- [3] Samuel Flagg Bemis.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A Foreign Policy of Independence [J]. in *American Historical*

- Review*, 1934 (39): 250.
- [4] Stephen Innes. Creating the Commonwealth: The Economic Culture of Puritan New England [M].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14.
- [5] Michael Adas. From Settler Colony to Global Hegemony: Integrating the Exceptionalist 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to World History [J].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1 (106): 1697.
- [6] 王立新. 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 [J]. *美国研究*, 2005 (2): 92-117+7-8.
- [7] George Washington. Farewell Address [M] // in Edward W. Chester, *The Scope and Variety of U. S. Diplomatic History: Readings to 1913*, Vol. 1,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 1990: 22.
- [8]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2: 24.
- [9] Kendrick A. Clements. William Jennings Bryan, Missionary Isolationist [M]. Knoxville: Tennesse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2: 15.
- [10] Ray Allen Billington. The Origins of Middle Western Isolation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45 (60): 54.
- [11] Selig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Century Reaction* [M]. New York: Abelard-Schuman, 1957: 43.
- [12] Alexander DeConde. The South and Isolationism [J].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58 (24): 335.
- [13] Paul W. Glad. The Trumpet Sound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 and His Democracy, 1896-1912 [M]. Lincoln: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0: 1.
- [14]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he Prince of Peace* [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Publishing House, 1925: 26-30.
- [15]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he Memoirs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 [M]. New York: Haskell House, 1925: 383.
- [16] Willard H. Smith. The Social and Religious Thought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 [M]. Lawrence, Kansas: Coronado Press, 1975: 79.
- [17] William Jennings Bryan. *Speeches of William Jennings Bryan*, Vol. 2 [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09.
- [18] William Jennings Bryan. *Tolstoy, the Apostle of Love* [M] // in William Jennings Bryan, *Under Other Flags: Travels, Lectures, Speeches*, Lincoln, Nebraska: The Woodruff-Collins Printing Co, 1905.
- [18] 布赖恩. 获取和平的力量 [M]. 波士顿: 波士顿出版公司, 1912: 11.